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张卫国 王 双

摘要 大国崛起的维度特征是：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确立，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世界一流，成功实现制度图新变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科学技术进步水平领先，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发展空间不断开辟延拓，军事实力持续得以加强，资源环境利用程度高，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同。大国崛起东亚模式除完全符合上述维度特征外，还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有效性，高度重视创造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传承儒家文化精华。大国崛起中国道路的特色在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一直建设学习型社会，着力打造创新型国家，独立自主地改革开放，协作型竞争和平崛起，人民有伟大梦想精神。

关键词 大国崛起 信息演进 东亚模式 中国道路

作者张卫国，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002）；王双，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002）。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9)10-0067-15

大国是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①崛起是指伴随经济社会结构根本变化的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的总体国土空间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及其在世界前列站位。^②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大国崛起范畴。大国崛起对世界影响巨大而深远。大国崛起重组世界地理空间；大国崛起重塑世界地缘政治；大国崛起改变军事实力对比；大国崛起深刻影响主流文化。^③

大国崛起的中国道路备受关注。因为其一，中国是典型大国。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土面积在世界排第四位，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总量大国，是当今世界对外经贸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其二，中国是文明古国。5000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重要思想源泉，为全球治理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发。其三，中国是后发国家。按照所谓“后发优势”的观点，后发国可以自由享用先行国技术进步的成果，而无须再为开发已有的技术而付出代价；还有可能获益于对特殊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此外，后发国家在充分认识新兴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① 学科不同，研究视角不同，对此界定不同。例如，发展经济学关于“大国”的标准，就主要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GDP或人均GDP，有时候还加上对外贸易规模等指标来衡量。本文所观察的对象，无论用何种指标衡量，都属于“大国”范畴，也就不再就“大国”概念问题详细讨论了。

② 同样，学科不同，研究视角不同，对此界定不同。但就目前各学科最大共识而言，“崛起”还是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现代化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如此，“崛起”的衡量指标就一定是国际可比的，肯定不是单一的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总量指标可度量的。

③ 这里把文化界定为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风俗习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不包括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狭义的文化。

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完全可能凭借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有效战略,抢占领先技术和产品发展的先机,实现“弯道超车”或开辟新路,取得对革命性产品的垄断地位,以及由领先技术和产品带来的持久的竞争优势。其四,中国是东亚国家。地理空间、地域文化、地缘政治、地区现状、内外格局、周边环境等,都是影响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这一切对于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的崛起当然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即使考虑到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新兴东亚地区^①的增长也是较为迅速和富有弹性的。尽管发生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滞胀,东亚依然与欧盟、北美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板块;东亚已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仅就此而言,处于东亚区域的典型大国、文明古国、后发国家的中国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一、大国崛起的若干维度

(一) 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确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最根本标志的两个结构性指标——工业比重、城市化率会持续提高和水平居高,其结果一般是^②,工业增加值比重在GDP中最高,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按从高到低的排序完成由“一二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转变;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变。荷兰、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崛起所依赖的现代社会结构基础,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开始演进了。17世纪荷兰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到独立时,荷兰各省中规模最大的产业是船舶业、帆布、渔网、绳索、鱼桶及相关产品的制造业,盐加工业,酿酒业,建材业以及毛纺和麻纺业。荷兰的服务业在本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③1700—1820年,英国上升为霸权国。其间,人口的增长率是欧洲国家中最快的,城镇化率在全国各地都有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明显下降。^④1913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英国,而且其技术水平也取代英国,最接近当时技术的前沿。而在此前的1820—189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同样明显下降。^⑤

(二) 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1400—1700年,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是欧洲最快的,而从1600年到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欧洲最高的。这是由于1600年前北欧有很多贸易机会,同时荷兰通过水利工程成功改造农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居高。^⑥在英国上升为霸权国的1700—1820年,英国人均收入增长快于17世纪,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在英国技术进步和实际收入增长的加速阶段,即1820—1913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大约为1700—1820年的3倍。1820—1870、1870—1913、1913—1950年间,美国人均GDP、GDP增长率都比英国高。1913年,美国GDP是英国的2.3倍,已是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大国。^⑦1950—1973年,日本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都明显高于西欧。1973年,日本GDP仅次于美国,已超过德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大国。^⑧

① 东亚包括东盟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加上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蒙古和中国台湾地区。新兴东亚地区指除日本外的上述国家和地区。发展中东亚地区指除去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新兴东亚地区。

② 不同学科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学者对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衡量标准有不同观点,有的专家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概念的特殊理解,建构了不同的衡量指标以及分析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标标准水平,但对于这里所简要说明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性、统计性结构指标水平是有共识的。

③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6—74页。

④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86—87页。

⑤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87、93—94页。

⑥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66、68页。

⑦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78—181页。

⑧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30、178、199页。

（三）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世界一流^①

1482年，葡萄牙在位于现在加纳海岸的埃尔明纳要塞建立黄金交易中心，而黄金是当时国王的最大收入来源。^②1600年前，荷兰通过水利工程成功改造了农业。17世纪中叶，荷兰创造了配备有纤道的运河网络，大大降低了泥炭、干草、小麦、牛、木材、建材和其他笨重货物的运输成本。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荷兰稠密的市区人口、优良的港口和四通八达的内河系统降低了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降低了政府服务的费用，也减少了对存货的需要。^③英国在1485—1700年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制度的创立时期，于1662年成立了皇家学会，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复辟时期创建了皇家天文台并设立了皇家天文学家职位。英国在上升为霸权国的1700—1820年时期，通过创建收税公路和渠道网络以及发展海岸运输极大提高了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更有效率的专业化劳动分工。英国在1820—1913年技术进步和实际收入增长的加速阶段，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它将伦敦到孟买的距离缩短了41%，到马德里的距离缩短了35%，到加尔各答的距离缩短了32%，到香港的距离缩短了26%。这不但降低了蒸汽轮船的燃料成本，而且使帆船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因为运河中缺乏风力。^④在日本，包括运输、通信、公共事业在内的社会间接资本的积累，在国家强有力指导下，自明治初期至20世纪初进展迅速。这些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工业化作出了无法估量的真正贡献。^⑤在美国镀金时代，19世纪铁路业迅速发展。再以城市供排水为例。1870年前后，只有最富裕的地区和少量的商业区有公共供排水系统。到1890年，一个典型城市25%到34%的人口可以享用到公共供排水系统，到1909年，在人口超过30万的城市，超过70%的人可以使用公共下水道。到1915年，官方估计在大多数城市，超过95%的当地居民可以使用公共供水。^⑥

（四）成功实现制度图新变革

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荷兰社会经济制度都是比较优越的：产权清晰，土地清册登记方便了产权的转让；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金融体系；税负较高，但它是对支出而不是对收入征税，从而鼓励储蓄、节俭和勤奋工作。1485—1700年，是英国创立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制度的时期。其间，17世纪也是英国经济制度沿着荷兰方向进行改革的世纪，包括封建割据被更集中化体系所替代，废除僧侣等级制度，政府管理现代化，成立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现代化，公债市场的出现等。^⑦特别是，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在传承1215年《大宪章》原则基础上确立的《权利法案》和君主立宪制为英国经济起飞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强有力基础；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在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指引下，英国结束了重商主义时代，建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日本在始于1868年的明治时期，卓越地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改革，包括废除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民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机会的教育制度；激励全国国民保卫国家的决心，创建近代式军队；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废除农民和土地的隶属关系等。^⑧美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在于拥有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制度安排，包括建立功能相对完善的政府机构；政府权力的有序交接，严格坚持法治并且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

① 这里的基础设施是指影响全国的重大生产与生活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商贸金融网点、城市建筑、水利、气象、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消防、公安、地震预测等各种必备设施。但时代不同，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不同，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也很不相同。

②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46、49页。

③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70—72页。

④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82、84、86、89—91页。

⑤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史》，景文学等译，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⑥ 普莱斯·费希拜克、斯坦利·恩格曼等：《美国经济史新论》，张燕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244、254页。

⑦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4—11、72、82—84页。

⑧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李杜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20页。

来裁决争议。美国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却扮演着若干种角色：界定和实施财产权利、维护缔约自由与“规范的司法管理”、提供国防这一典型的公共产品、弥补市场机制种种缺陷的必要的政府干预、改变经济激励结构的收入再分配等。^①

（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15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促使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经济交往的活动。在发展欧洲对大西洋诸岛的贸易、航行和殖民方面，在开拓环绕非洲、进入印度洋和联系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路线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荷兰是 1400 年至 17 世纪中叶欧洲最繁荣的经济，而航运和商业服务业则是它收入的主要部分。它在推动国际分工的专业化方面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国家。1820—1913 年间，英国对外开放政策对人均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1846 年，取消了农业保护性关税；1849 年，限制国外竞争对手的《航海法》被中止了。到 1860 年，英国单方面取消了所有贸易和关税上的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这些含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意味着双边自由化同等地应用于所有参与国家。从 1870 年起，以海外投资为目的的英国资本大量流出，相当于它储蓄的一半。1853 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访日，逼迫日本开放门户。此前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决定接纳西方文明，从此走上对外开放之路，为日本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和商业政策与战前有很大不同，主要致力于技术传播，促进海外投资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美国的这种政策新动向，在其 1948 年推行的，旨在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已经明显反映出来。^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 1950—1973 年这一黄金时代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美国主导建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等，创建起新型的自由国际秩序。^④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活动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8—1979 年间美国巨大经济扩张的推动力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广泛流动。^⑤美国是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的主要获利者。从战后到 1988 年，美国的国外资产总额一直超过其负债总额，但以后其国外净资产水平从零左右降到-1.5 万亿美元（超过 GDP 的 20%）。因此，全世界帮助美国保持了长期繁荣，为它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提供了资金。^⑥纵观大国经济崛起和美国成为第一强国的历史可见，第 45 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任内美国政府于 2018 年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起贸易保护主义之战，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言。

（六）科学技术进步水平领先

16 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得益于它为航行印度所作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研究计划，其涉及延续多年的船舶技术的试验、导航仪器和海图的改进、应用天文学以及关于海风和海流知识的发展，对替代航线的研究。17 世纪荷兰成为世界商业帝国，得益于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船舶工厂以便在海上处理刚刚捕捞上船的鲑鱼，也发展了成批地生产低成本通用货船的方法。^⑦19 世纪英国是生产率水平最高的国家，是向新技术领域的主要推进者。19 世纪末德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得益于 19 世纪德国在诸如化工部门已是世界的领先者。^⑧20 世纪美国对其他先进国家的领导能力比 19 世纪的英国更大，这是为什么世界经济在 20 世纪能够比 19 世纪更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的前沿被推进得比以前更快了。^⑨从西方国

① 普莱斯·费希拜克、斯坦利·恩格曼等：《美国经济史新论》，第 2、4—13 页。

②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 10—18 页。

③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6—8、96 页。

④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8 页。

⑤ 戴尔·W. 乔根森、弗兰克·M. 戈洛普、巴尔巴拉·M. 佛劳梅尼：《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李京文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 页。

⑥ 安格斯·麦迪森译：《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127 页。

⑦ 安格斯·麦迪森译：《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9—10 页。

⑧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72 页。

⑨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年，第 12 页。

家引进先进技术，对于日本和俄国经济增长极其重要。日本自明治时代就特别注意引进推广西方先进技术，整个20世纪一浪接一浪地引进、推广、改进了有形和无形的先进适用外国技术为己所用。改进工程学或价值工程在日本成了一门艺术。19世纪俄国大力依靠西方技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俄国南部建造的钢铁厂，其技术水平和规模与当时西欧正在建造的钢铁厂相同。^①

（七）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法国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喜好培育了国民对思想文化的推崇，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法国得到了普遍传播。启蒙思想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想的大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颁布。1697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和学习。回国后，他强硬推行了一场从穿衣、吃饭到科学教育等的社会变革，用野蛮手段推进了俄罗斯的文明进程。继承彼得改革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引进欧洲的启蒙思想，重视教育，并试图起草法律。18世纪后期，俄罗斯成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并成为欧洲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在战争—革命—改革的多次反复中，这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并借此完成了由农奴制向工业文明的蜕变。

（八）发展空间不断开辟延拓

发展空间可以有形的，例如陆、海、空等实体国土空间；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空间开发技术提高或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或数字化信息网络空间构筑等所带来的空间开发利用效率提高，进而创造了崭新的实体或虚拟发展空间。^②葡萄牙是欧洲向大西洋扩张的先驱，1500年它发现了巴西，并由此在美洲开始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开发；1600—1820年，按人均收入水平衡量，荷兰是欧洲的领先经济体，同时，它在亚洲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贸易帝国；英国在国际化 and 商业发展方面采取了荷兰模式，建立了更加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是工业和运输技术方面的先驱。西方国家发达的过程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武力侵犯，美洲的欧洲殖民化意味着对土著居民的灭绝、边缘化或征服；欧洲与非洲三个世纪的接触集中在奴隶贸易上。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屡屡战争目的在于建立或维护殖民统治和贸易特权。另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伴随着一系列掠夺性战争和损人利己政策。^③

（九）军事实力持续得以加强

17世纪70年代，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俄罗斯的陆军规模分别是12万、7万、11万、1.5万、13万人；18世纪，以上各国的陆军规模分别达到40万、5万、10万、8.7万、17万人；1812—1814年，法国、英国、俄罗斯的陆军规模分别是60万、25万、50万人。^④崛起后的德国，军费开支逐年递增；德军规模不断扩大，装备一再更新、改善，1914年训练有素的陆军达到51个师，75.4万人，是欧洲最强大的。^⑤日本明治维新后，领导者们学习西方各国军备制度知识，激励全国国民保卫国家，以全新思想创造近代史军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直至靠强大军事实力打赢日俄、日清战争，武装侵略中国东三省建立所谓“满洲国”，与德国、意大利一起建立“三国联盟”对抗英美^⑥，成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美国从二战中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冷战时期，尽管军费支出长期稳定在很高水平，但仍有1965—1968、1979—1989、2001—2003财年军费支出的大幅增长。21世纪初，军费开支的第四次增长又开始了。^⑦

①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8—241页。

② 人类对外空间的认知、开发和利用更是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对发展空间的广泛、深入和系统思考和实践活动。发展空间的延拓，则包括合法与非合法、和平与战争等多种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国家崛起或成为发达的过程，经常是通过非法或侵略途径开辟延拓发展空间的过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兴起，合法、海陆空统筹、无形开辟延拓发展空间已成为常态。

③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7—38页。

④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73页。

⑤ 鲁仁：《德国百年行踪》，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

⑥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20、39—41、58—64页。

⑦ 普莱斯·费希拜克、斯坦利·恩格曼等：《美国经济史新论》，第464—470页。

(十) 资源环境利用程度高

以煤炭资源的利用为例,以百万吨油当量计算,2009—2015年已经崛起的大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分别占世界煤炭产量的11.9%、1.1%和4.8%,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则占47.7%;同期美国、德国、俄罗斯分别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10.3%、2.0%、2.3%,中国则占50.0%。^①再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例,以公吨计算,2007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分别为6.0、9.6、9.8、10.6、5.5、10.8、8.0、8.8、19.3,所有这些崛起大国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6),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也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3);其中,美国还大大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2.5)。^②

(十一) 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不同时代,大国崛起时的人口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经济体量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人均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基础等指标具有明显差别;不同地域,各个大国崛起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战略目标、产业选择等明显不同。

(十二) 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同

葡萄牙开拓海外商业和建立帝国是渔民、国王和外来“新基督教徒”共识的结果。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的《权利法案》,标志着群体而不是个人统治国家的社会共识,为经济起飞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延续到今天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则更是国内外广泛赞同的结果。美国开创的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于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迄今还是世界各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的先进模式。

二、大国崛起的东亚模式

(一)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的存在性判定

模式的概念,用于表达特定事物活动的整体性、本质性、代表性或某些共性特征,包括“样品”“模型”“典型”“形式”“路径”“方法”“图样”等一系列相近词汇的含义。所以,视侧重点不同,英语可以翻译成model, mode, method, pattern, schema, style, path等不同词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模式经常翻译成英语单词model,如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ast Asian Model等。东亚国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已是崛起大国,而当今中国也是世界公认的崛起中大国。这里通过归纳总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抽象提炼大国崛起的东亚模式,并不是说这一模式可以普适于整个东亚地区。我们也可以将这里的所谓“东亚模式”理解为这几个大国崛起为代表的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的东亚大国模式。东亚大国的崛起可以分解为由东亚地理空间、地域文化、地缘政治、地区现状、内外格局、周边禀赋等所决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维度,具体表现在现代社会结构确立、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及其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对外开放、科学技术进步、先进文化传播、发展空间延拓、军事实力加强、资源环境利用、时空特征、国内外共识等各方面,形成特有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模式。世界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财政部等机构的研究成果和翻译成果对“东亚奇迹”以及“东亚模式”都有颇多认同。^③

(二)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的维度特征

从现代社会结构确立维度看,已经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正在崛起的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序,均已经完成由“一二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转变;城市化率均已经达到50%以上。^④但在崛起过程的起点,东亚大国以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或就业比重、城市化率衡量的现代社会结构基础明显薄弱。例如,1890年日本城镇化比率是16.0%,相当于1500年荷兰

① 黄晓勇主编:《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1—36页。

② 世界银行:《2012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4—405页。

③ 参见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东亚奇迹的反思》。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42、101、107页。

(15.8%)的水平^①；而中国1952年城镇化率仅为12.0%，明显落后于荷兰1500年的水平。^②1878年的日本农业增加值比重依然在60%以上，传统农业社会特征明显；而早在日本之前，1789年的法国就已经使农业增加值比重降到50%。^③农、林、渔业的就业比重，1870年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分别是70.1%、50.0%、49.2%、49.5%、37.0%、22.7%，1950年中国是77.0%^④，可以看出日本、中国开始崛起时，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征比先行崛起的西欧诸国和美国在开始崛起时要突出得多。1972年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占比，同样完成崛起的日本，除俄国外，比先行崛起的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都高。^⑤再次说明其崛起开始时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突出，崛起完成时还要继续追赶先行崛起大国的现代社会结构水平。

从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维度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高水平增长的阶段，而且多伴有“加速期”，最终，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大国和人均收入水平居高的国家。目前，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指标，新加坡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日本、韩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韩国则远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但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⑥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偏上国家水平、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正是为什么说中国崛起还在过程中的主要依据。

从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东亚崛起或正在崛起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也远比先行崛起国家迅速。日本非居住用建筑资本占GDP的比率及其增长速度^⑦，中国铁路总长度、公路网长度在世界排名，中国、韩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世界排名，韩国每千人电话主线、每千人宽带用户在世界排名^⑧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制度创新维度看，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挤进了工业和军事大国的前列。^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走上“富国强兵”之路。^⑩1961年以后，韩国的军事统治宣告结束，开始进行经济和外贸政策的重大改革。70年代韩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⑪经过改革，韩国形成了独特的权威协调集体行为的市场经济类型。^⑫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从统一人民的语言开始，经历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所指出的“调整又调整，改革又改革”^⑬，逐步形成了国家权威做后盾的法律规范，务实主义的政府领导，功能广泛、管理良好的公共部门，国家以法令规定控制的投资和就业等有机统一的当代典型的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类型。^⑭新加坡独立后短短3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韩国、香港和台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⑮197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大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改革，极大地解放、发展和创造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世界奇迹”。

①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46页。

②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③ 宫崎犀一、奥村茂次、森田桐郎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陈小洪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8—29页。

④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7页。

⑤ 西里尔·E.布萊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390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17）》，第19—22、27—30页。

⑦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4—15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17）》，第278、285—286、291、294页。

⑨ 西里尔·E.布萊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183页。

⑩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史》，第15页。

⑪ 马洪、孙尚清主编：《市场经济300年》，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第292—293页。

⑫ 左大培、裴小草：《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0—246页。

⑬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51—194页。

⑭ 左大培、裴小草：《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第88—125页。

⑮ 马洪、孙尚清主编：《市场经济300年》，第274页。

从对外开放维度看,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 解除了一切保护措施, 冲向国际经济竞争的浪潮。^① 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起之所以成为“亚州四小龙”,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 这已为所有国际权威研究成果所证实。中国自 1978 年以后, 成为有担当、负责任、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

从科学技术进步维度看, 已经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正在崛起的中国都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科学技术进步水平世界领先的典型。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是世界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最有成效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加大了 R&D 的投入力度, 1980—1985 年, R&D/GNP 的比率就已达到 2.6%, 与先进的美国、瑞典、西德大致相同。^② 韩国自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62—1966 年) 以后, 一直致力于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科技进步, 特别是“六五”计划 (1987—1991 年) 的主要战略是“自主技术开发战略”, 旨在向高科技发展, 自主开发技术密集型商品, 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合作。^③ 新加坡土地窄小, 人口密度很高, 自然资源匮乏, 但只用一代人的实践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 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重视新知识、新科技以及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创新产品或服务。^④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科学技术进步水平迅速提升, 在一些科技领域正在经历由“跟跑者”到“同行者”再到“领跑者”的历史性巨变, 伴随经济崛起, 正在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奋进。

从先进文化传播维度看,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都是近距离或直接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对经历几千年历史演进形成的儒家文化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加上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的选择性传播和应有的本土化, 使得各自的先进文化传播卓有成效地助推了本国的崛起进程, 进而越来越呈现出做实做大做好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态势。德川时代, 日本人的价值观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⑤, 后来一直保留着重集体高于个人的倾向。明治维新后, 西方发达文明急速普及; 通过邀请外国教师把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日本, 努力普及高等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美国教育制度; 从废除军事独裁封建制、诞生立宪君主制, 到 1946 年制定了日本国宪法, 宣布了议会制民主主义。^⑥ 从 14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成为日本殖民地, 韩国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的新儒学; 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到转而由美国占领, 给韩国带来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因素, 集中体现在民主的、理性的、科学的和工业的价值观以及与这些价值观相适应的人格气质模式上。^⑦ 新加坡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之都”, 经历了从移民杂居、没有历史沉淀、没有灿烂文明成果的多元文化到“儒家运动”和“共同价值”先后登场, 并与西方发达的科学、法律、教育文化融合发展的崛起过程。^⑧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 具有五千多年的优秀中华文明。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成。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 也吸收了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优秀的文化成果, 它是人类文明成果和多元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从发展空间延拓维度看,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在有形与无形, 陆、海、空等发展空间的广度、深度、高度以及效率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不断破除实体空间对发展的种种制约。目前, 新加坡是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创造 GDP 最高的国家, 而日本、韩国也都大大高于美国。明治维新后, 日本在开拓发展空间方面, 曾走过一段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 对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动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实行野蛮的殖民地政策。如今, 日本已成为海运强国、航空航天潜力大的国家,

① 吉田茂著:《激荡的百年史》, 第 128—129 页。

② 南亮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 景文学等译: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1 年, 第 137 页。

③ 马洪、孙尚清主编:《市场经济 300 年》, 第 293—305 页。

④ 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蒋宗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第 103—109 页。

⑤ 当时儒教被定为官方哲学, 用以排斥其他一切意识形态。

⑥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史》, 第 6—7 页。

⑦ 左大培、裴小革:《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 第 222—226 页。

⑧ 匡守球:《星岛崛起: 新加坡的立国智慧》,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第 220—232 页。

单位国土空间开发效率高，克服了实体发展空间“资源小国”的约束。韩国是当今海运强国、互联网运用强国，单位国土空间开发效率比日本还高。新加坡也是海运强国、互联网运用水平高于美国，特别是单位国土空间开发效率居世界之首。中国已是世界陆运、海运、航空航天、互联网运用大国，特别是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等正引领世界潮流，“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使得中国成为发展空间延拓潜力越来越强的国家。

从军事实力加强维度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富国强兵”政策，经历日俄和甲午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作为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之一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败等军国主义发展道路，以及近年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充分表明日本在不断加强军事实力。目前韩国军费占GDP比重、军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均已远超出日本和中国。新加坡国防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国防预算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国防费用都居世界各国前列，是东南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已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军力大国，正在向军力强国快速迈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由军力大国向军力强国阔步前行，中国军力现代化水平迅速跃升。综合诸多研究文献可见，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的军力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其中，中国已经位居世界前三位。

从资源环境利用程度看，以煤炭资源的利用为例，以百万吨油当量计算，2009—2015年中国占世界煤炭产量的比重，远高于美国、德国、俄罗斯；同期中国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比重，远高于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高于德国，日本还高于俄罗斯。^①再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例，以公吨计算，2007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日本、韩国、中国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②

从时空特征维度看，东亚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同样在不同时代崛起时的人口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经济体量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人均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基础等指标等诸多方面，既表现出了各自的明显差别，也表现出了整体与先行崛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明显不同。地理空间不同，东亚四国在大致相同的崛起阶段，人口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很不相同；相对于先行崛起的西方发达国家，崛起过程中既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类似于先行崛起国家荷兰，也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经济体量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方面看，前已述及，东亚四国在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高水平增长的阶段，而且多伴有GDP、人均GDP年均增长的“加速期”，最终，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大国和人均收入水平居高的国家。在经济结构基础方面，日本、中国等东亚大国开始崛起时，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征比先行崛起的西欧诸国和美国开始崛起时要突出得多，以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或就业比重、城市化率衡量的现代社会结构基础明显薄弱，崛起完成时还要继续追赶先行崛起大国的现代社会结构水平。

从国内外共识维度看，在日本，强调简朴、勤劳和忠于集体的价值标准可以部分地追溯到德川时代武士的传统，在整个现代时期，大部分社会阶级盛行这些价值标准，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每个国家都还负有追赶最发达的社会的特殊使命，即便是在那些已经达到同等水平的领域也是如此。^③二战结束后，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日本人依然可以呈现一种文化国家复兴中的精神面貌。^④在韩国，制度文化具有新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背景，形成了权威协调集体行为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紧密的企业-政府关系，这从制度安排上保证了指导全国的五年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⑤在新加坡，典型的现代法律规制有效整合了多元种族与文化^⑥，通过“奋斗”文化到“儒家运动”，再到“共同价值”的

① 黄晓勇主编：《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17）》，第31—36页。

② 世界银行：《2012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第404页。

③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417—418页。

④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96页。

⑤ 左大培、裴小革：《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第220—237页。

⑥ 左大培、裴小革：《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第88—125页。

演进, 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显著增强, 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更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 在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时也更多了一份“精气神”。^① 而在中国, 已经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一同被称为成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而中国的崛起已是世人共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执政后从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到全面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行为, 更加证明了中国崛起的大势已成。

(三)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的归纳总结

(1) 注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有效性。东亚四国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突出表现是, 不仅都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期, 而且都存在“加速期”, 直到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大国或人均收入水平居高的国家。东亚崛起中表现的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性, 正如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② 一书中所指出的, 关键在于: 第一, 坚持宏观经济管理基础, 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 鼓励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积累的较低的通货膨胀; 谨慎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 并积极与其他政策配合, 以便更多人更平等地享受高速增长成果; 可以维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 金融业的发展和逐步开放, 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内储蓄(储蓄的最初动力来自快速增长), 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 与全球金融体系接轨; 支持初级和中级教育, 努力创造一个拥有外向发展技能的阶层。第二, 强调发展一套官僚体系的策略, 这个体系能够认知和执行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强政府”的功能, 并能够就长期规划做出值得信赖的承诺。第三, 东亚政府采用积极参与政策, 加速工业化步伐, 增加工业产品中出口的比重。第四, 采用实用主义方法, 强调长期目标和策略, 采取灵活措施, 达不到目的就放弃, 以保证政府支持有效。^③ (2) 高度重视创造人力资本。除了支持初级和中级教育外, 最突出的表现如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 加强 R&D 投入力度,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用先进文化教育人。(3)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通过基础设施水平以超过先行崛起国的速度提升并迅速达到乃至引领世界一流, 为崛起和崛起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立足国情的制度创新, 建构起特色鲜明的现代制度体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迅速提升, 根除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障碍; 通过对外开放, 在充分利用了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本、两种资源的同时, 还卓有成效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了世界一流的先进科学技术, 引进、招揽乃至留住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和智力, 引进、学习、嫁接、改造了世界一流的管理经验和方法; 通过总结先行崛起国家走传统工业化老路所引致的对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对环境污染的教训, 在资源环境利用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路。(4) 传承儒家文化精华。突出表现在制度文化具有新儒学“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精神特质, 在行为上崇尚节俭, 强调勤劳, 注重实际, 忠于集体, 善于协作, 讲究长远, 尊重自然。

三、大国崛起的中国道路

(一)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创立,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科学思想体系。正如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30 周年而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直接继承了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① 匡导球:《星岛崛起:新加坡的立国智慧》,第 220—232、205—219 页。

②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编:《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年。

③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东亚奇迹的反思》,第 5—6 页。

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仅代表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脉传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和先进的理论成果。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如今发展到拥有 9000 万党员；能够长期执政、如今执政已达 70 年的思想根源。而且，这也与许多西方“轮流坐庄”的所谓“选举型”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难以形成也没有形成长期指导思想，更不用说形成既与时俱进、又一脉传承的先进的政党指导思想体系；只代表特殊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走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崛起成为现实，如今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①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近百年、执政 70 年的任何时期，都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一是选举中有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在选举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人员中的广泛民主性，而广泛的民主性就从根本上保障了选举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确保了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不断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上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方宪政民主制的“民主公地悲剧”，古代世袭终身制的“政治基因”缺陷、“首脑能力”缺失等所导致的各种执政不可持续的问题。二是选拔中有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党员入党条件、义务和权利的规定，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并指出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加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选贤任能、竞争择优、群众公认等原则，从根本上保障了各级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的不断完善。三是监督中有自我完善内生机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应地，制定了一整套党内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对于执政监督，建构起一整套制度规范，标本兼治，可持续进行，这也从根本上保障了执政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目标和长远规划的领导型政党。首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充分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 年第 7 期。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必须立足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次，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十九大提出从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的 30 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阶段奋斗目标的安排。再次，从 1953 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开始至今，已经连续制定了十三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对各个五年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发展重点或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进行了系统、合理和切实可行的部署和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国才更能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有效、社会秩序稳定演进等，也才更能实现迅速崛起。

（二）一直建设学习型社会

塞萨尔·伊达尔戈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非稳态系统、固体物理和物质的可分析计算能力三者，是宇宙中信息存在与增长的物理机制。人类算是代表了物质的分析计算能力的最高水平。信息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而正是人类分析计算能力的进步，加上人类创新产物的长期积累，才有了信息增长进而经济的增长。就可持续增长与发展而言，因为储藏了丰富的信息，所以，当这个宇宙不断发展、熵值不断增长时，我们的星球则继续走在一条抗争着这一趋势的路上。^①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而学习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更重要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的社会福利增长很重要，通过缩小知识的差距，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单纯积累资源带来的增长要快得多。创建一个学习型经济和学习型社会的政策不仅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也会在更广的层面上重塑一个国家的社会，二者的结合可以在现在和未来共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作为古老民族，中华民族 DNA 的演进必然经历更加漫长的岁月，并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无论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学习，还是对人类创造的信息存量的学习和增量的贡献都是如此。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孟儒学至今，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中国古代科考制度至今，各级政府官员的选拔总体上都对学问、学识和学历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同时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东亚各崛起大国都高度重视学习，因为它们都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内。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D. H. 珀金斯早就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大国，根源之一在于重视正规教育，这是传承孔子重视教育的思想的结果，而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投入大幅增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制定实施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该规划确定：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近年来，随着线上线下结合的崭新学习平台的建立，公民、企业、学校、社会各界互联互通的学习网络已经形成，中国迈向学习型强国的步伐明显加快。

① 塞萨尔·伊达尔戈：《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浮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206—207、211 页。

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陈宇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386、396—397 页。

③ D. H.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大国》，金志有、张乃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年，第 7—8 页。

（三）着力打造创新型国家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有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等伟大发明。李约瑟明确指出：在公元后最初的14个世纪里，中国传给了欧洲极为丰富的发现和发明，而西方在接受这些发现和发明时往往并不清楚它们源于何地。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来就是单纯的“经验论者”。中国的成就不仅在技术方面，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有一整套自然理论体系，有系统的有记录的实验，而且有许多极为精确的测量。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科学囿于表意文字的范围，很少向外渗透。中国人的理论最后阶段仍然是中世纪型的，因为这些理论并没有促成文艺复兴以及对假说的数学化。^①“李约瑟问题”的标准提法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②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李约瑟本人以及其他众多学者从中国与西欧之间社会经济模式的差异的比较中给出了多个维度的解释。但笔者认为，从大国崛起的本质是信息演化的结果的角度，还可以给出大国崛起所面临的一般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之外的第四个陷阱即“演化速度陷阱”的解释：作为信息演进的结果，大国崛起以后会由于大而自满、大而失敏，或变大后继续信息演进的代价也更大等原因，使本身的信息演化速度放缓，从而被其他国家赶上或超越。^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进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主张创新是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在内的系统创新，实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有关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提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制定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58.5%。目前，在导航系统、航天、手机、通信、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安防、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科技实力已处于世界前列。

（四）独立自主地改革开放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典型大国崛起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写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篇章，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从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单项突进到全面配套，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开辟了大国制度创新的崭新路径。开放会使一个国家的信息演化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增大信息存量和创造新的信息，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曾深受闭关锁国的危害，“李约瑟问题”与“演化速度陷阱”的解释，实际上反映的就是闭关锁国的问题。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重大举措：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海关特别监管区、自由贸易区，谋划自由贸易港，加入WTO，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不受所谓“华盛顿共识”影响的。后者的“休克疗法”曾导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挫败。

（五）协作型竞争和平崛起

源于儒家思想的和谐、和平、合作或协作理念，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习近

① 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6、50—51页。

② 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176—202页。

③ 当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中国，在世界上虽是大国乃至强国，但仍属于传统农业社会，不符合本文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现代化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实现过程的“大国崛起”的定义，但这并不影响对问题的理解。

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是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已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并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国土空间、经济总量、资源环境利用大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中国认真履行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和方案,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文件;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缔约方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积极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严格履行承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倡导生态引领、绿色发展,保持了战略定力。2019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六) 人民有伟大梦想精神

中国人民的梦想精神是古老中华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用信息演化的视角看,这是信息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信息结构和组合的具象或表现。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演进历史,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到今天的文明大国,历史上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②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识,而且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普遍的认同。

四、结语

从信息演化的视角看,中国崛起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五千余年中华民族文明基因信息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崛起也是中华文明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中国发展曾经长期在世界领先,但由于社会经济模式或者“演化速度陷阱”等大国崛起中的各类问题,也曾长期失去了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前,国际社会可以有各种理由不看好中国。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使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也是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没有崩溃,综合国力反而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

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演进水平等主要指标水平看,从现阶段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发展环境所带来的挑战看,中国还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中国需要解决长期发展中所累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济结构、创新体系、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反腐倡廉等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87—288页。

②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各个方面；也需要面对崛起中出现的崭新问题，如怎样参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秩序的改革创新，有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方案和中国力量。跨越大国崛起中的各种“陷阱”，还需要从历史经验、现实实践、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中，探索出更加科学的理论，制定更加符合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方案举措。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高效生态产业发展研究”（16AJY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Eastern Asian Model and Chinese Road

ZHANG Weiguo, WANG Shuang

Abstract: The dimen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are as follows: basically established modern society structure, fast grew per-capita income and total economic output, world-class level infrastructu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xpanded opening-door policy,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de spread advanced culture, opened up development space, reinforced military power, high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 distinct space-time features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addition, Eastern Asian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ong-term dynamic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essence culture. The Chinese Road of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the long-time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the rapidly creation of innovative country, the independently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peaceful growth of 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dream spirit of our whole nation.

Key words: the dimension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Road,